

## “忠闾”：元明时期 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sup>①</sup>

认为中国宗族南盛北衰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而且既有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南方。<sup>②</sup> 即便如此，中国北方仍然存在宗族的事实却是需要解释的。换言之，这里为什么会有宗族？这里的宗族与中国其他地方比如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相比，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本文即以元明时期山西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设为个案，探讨杨氏是如何一步步建设宗族的，以及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地域文化”。本文集中探讨元明时期，是因为这是宗族的礼仪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宗族礼仪进入中国各个地方的时间与方式不同，因此在地域对比上也有意义。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碑刻和族谱。鹿蹄涧村的祠堂，现在保存的碑刻有元代泰定元年（1324）《弘农宗族图碑》、天历二年（1329）《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嘉靖三十年（1551）《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和嘉靖三十五年（1556）《表忠闾碑记》，后面二通碑分别是记载山西巡抚、山西提学副使和雁平道表彰杨氏一族的。

另外一些元明时期的文献则收录于《杨氏族谱》。族谱在明嘉靖、万历年间

陆续修成，目前能见到的《杨氏族谱》分别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重修版。道光族谱开头的一部分是“旧谱纪略”，即属于明代的文献。结合碑刻和其他材料，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献定位在一个大致的年代。本文在一定意义上，亦可以说是在分析这些文献的产生及其意义。

### 一、崛起于坚、代之间的世侯

杨氏活动的地点主要在代州（今代县）和坚州（今繁峙县）交界的马峪、雁头、东留属和鹿蹄涧等村。他们早期主要生活在坚州一边，后来最迟在蒙古国时期迁移到代州的鹿蹄涧村。这些村落的地理形势是北靠雁门山脉，南临滹沱河，村落附近的马峪河等都是滹沱河的支流。

北宋时期，由于这一带是宋、辽对峙的前沿，朝廷在雁门山一线的若干谷口驻军，形成了军寨。鹿蹄涧附近的胡峪以及马峪河上游的马峪寨，当时都是军寨，<sup>①</sup> 这些军寨在金代则升级为镇。<sup>②</sup> 从蒙元时代开始，杨氏即以宋代的大将杨业为始祖，因为据说杨业曾驻兵于马峪，“自宋朝初兴，繁峙创立，曾任为官长焉”。<sup>③</sup> 从现存资料来看，杨氏最迟在金代就生活在那里了。

实际上，鹿蹄涧杨氏的起家，开始于金蒙战争中崛起的世侯杨友和杨山兄弟。金末，蒙古军与金军在山西进行过多次战斗。在代州，明确记载的战斗有贞祐四年（1216）九月、兴定元年（1217）二月和兴定二年（1218）八月。<sup>④</sup> 其中，1217年，蒙古兵进攻雁门关。当时金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附近一些地方为求自保，便推举了一些有威望的人士，向蒙古军请降。当时，坚州的王兆、刘会等便是这样的一批人。刘会被封为坚州都元帅，王兆被封为左监军会军事判

① 《宋史》卷86，中华书局，1977年，第2133页。

② 《金史》卷26，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页。对山西的镇的介绍，见田萌《金代山西的镇》，《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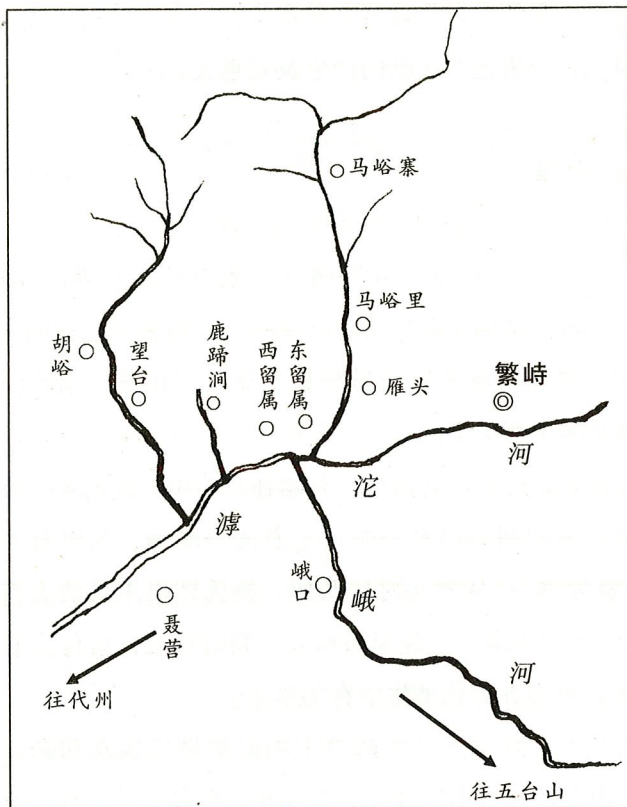
③ 《龙虎卫上将军镇河东北路雁门留属兼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左领军行元帅杨公讳友碑记》（下简称《杨友碑记》），约为元代撰，收录在道光《杨氏族谱》卷12，“艺文”。由于笔者的该版本族谱不全，此转引自新编族谱，第155—158页。以下除非特别说明，所引皆为道光族谱。

④ 《金史》卷14，第320页；卷15，第328、339页。

① 本文曾在2008年6月北师大历史学院的一次报告会以及2008年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地方社会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得到赵世瑜、科大卫、郑振满诸教授的批评指导，谨此致谢。

② 关于宗族研究史的回顾，可参看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40—162页；井上彻《日本学界关于明清时代宗族问题的研究》，《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6—94页。

官，战争中掳到的人口也被放回。<sup>①</sup> 杨友极可能也是此时归顺蒙古的。族谱记载：



马峪及鹿蹄涧位置图<sup>②</sup>

(杨友) 性好弓箭，事多权计，体仁行义，怜悯鳏寡，赡助贫穷，朋友交游，多结四方之豪杰，抱义怀忠，有岁寒之梗概，众皆仰视其风规，无不赞扬而悦服。后时战斗相持，干戈并起，凶歉相仍，黎民流亡，不可胜记。会遇大元天赐勃兴，奄有区夏，公率方境之民顺天归命。<sup>③</sup>

归顺蒙古，被看成是顺天归命，杨友亦由此获得对“方境之民”的管辖权。跟同时请降的王兆、刘会相比，杨友一开始并没那么显赫，他很可能是后来立功才升为坚代永定军节度使的。《金史》、《元史》都没有他们的传记，光绪《代州志》则评论说：“世祖以前，草昧初开，其豪长鸠集荒残，能自成一旅即置为帅，如崞县之崞山军，五台之清凉军，皆有节度，仍金官制，与坚代之永定军皆一时权宜，至建设路府而军号并革矣。”<sup>①</sup> 事实上，金元时期，北方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世侯在把持，大者如真定史天泽、东平严实、益都李全等，都是蒙元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物。山西地区同时也崛起很多中小世侯。他们父子相承，得以长期保持地方有力者的地位。<sup>②</sup>

杨友归顺蒙古，其实是在动荡的环境下的一种崛起策略。第二年（1218），金蒙军队在这一带又有战争发生，蒙古军队并于当年攻占代州。杨友不仅随蒙古军南征西讨，而且也在本地的争夺战中获取许多利益：

时南山贼未灭，侵夺河东太原，坚、代复破。公率百骑设伏以断归路，贼兵果至，公不避矢石，提兵入阵，奋击贼军，其贼大溃，步岭而南走，公斩首级，夺到金鼓、旗、羊、马、牛各千数，由此潞阳弗敢视，威震一时。<sup>③</sup>

“南山”即五台山，在坚州南境。所谓的“南山贼”，其实是原金将武仙的军队。这支军队是当时五台山区直到河北的一支强大力量。在正大二年到四年间（1225—1227），武仙叛，与河北世侯史天泽互相攻杀。武仙部下姬节、董佑往西入山西，攻打忻州、孟州等地，而山西较早投降蒙古的世侯则进行反击。<sup>④</sup> 从杨友碑记来看，武仙的势力盘踞在五台山脉中进攻代州、坚州一带，也应该是此时。杨友从进攻“南山贼”中获得许多战利品，夺到“羊、马、牛各千数”，并

① 至元（具体年代不详）《刘元帅墓碑》、皇庆元年（1312）《王氏世德之碑》，分别见《繁峙碑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143，144—160页。

② 绘制此图综合了《繁峙碑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所收地图）和《山西省地图集》（山西省测绘局，1995年，第124页代县地图）。

③ 《杨友碑记》，前揭。

① 光绪《代州志》卷1，“职官表”，第25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5年。

② 瞿大风《金元之际山西的汉人世侯》，《蒙古学信息》，1999年第2期。

③ 《杨友碑记》，前揭。

④ 见至元二十六年（1289）《故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宣授征行千户周侯神道碑》，《定襄金石考》（《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卷2，第40—49页。

且确立了在滹沱河北岸的优势地位。

他们在金末投降蒙古，然后又清理盘踞在南部五台山区的残金军队，创筑城池，使得当地免却了战争的进一步蹂躏。局势稳定后，又招集流民，开发地方，营造公府、庭馆、台榭，不仅如此，他们还赞助寺院和学校等。

杨友因为剿灭五台山残金军队，开发留属地方，“蒙皇二大王韩开府恩命，迁龙虎卫上将军，镇河东北路雁门留属兼坚代永定军节度使，左领军行元帅”。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杨友曾经有效地统辖坚、代二州全部地方。实际上，由于地方同时也存在其他的世侯势力，杨友统辖的核心区域只是滹沱河沿岸的留属地方。“奈公以谦逊为心，乃保留属之地”，<sup>①</sup>也就是在“滹阳”，即滹沱河北岸地区确立其优势地位。而对杨友一直提携的“韩开府”，很可能就是北面金城（今应县）的另外一个大世侯韩浩。韩浩起家，同杨友一样，也曾经向五台山进攻。最终他在五台山下的聂营占有别业千顷，正与杨友的留属隔河相望。<sup>②</sup>因此可以说，杨友与其他世侯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共同分享地方利益的过程。

杨友杨山创下的事业延续到他的后代。杨友七子一女，儿子几乎个个都有官职，比如次子思忠任振武军节度使，三子思难任征行千户。杨山的儿子思温任代州管民长官、思恭任代州达鲁花赤。第三代仍然继续着这种地位，比如杨山的一个孙子杨璋任代州达鲁花赤，而杨友的一个孙子任代州提领。<sup>③</sup>

因为这种地位，他们也往往与其他大族联姻。比如杨友七子一女，杨山六子二女，“男女婚姻悉皆宦族”。杨友的从弟杨希有一女，嫁给“累占科甲”的赵泰，赵泰是金朝代州唯一的进士，其外孙就是后来位至大都路总都管的姚天福。<sup>④</sup>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世侯王兆家族也是“联姻引戚，莫非卿士大夫”。他们已经告别了平民的身份，以能够攀附或者跻身士大夫的地位而自豪。<sup>⑤</sup>这种局面的开创，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政治投机和政治联盟带来的结果。

① 《杨友碑记》，前揭。

② 《报恩寺碑》，见姚燧《牧庵集》，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3—514页。

③ 《杨族世系碑》为《题世将杨族碑记》的碑阴，碑存鹿蹄涧杨氏祠堂。

④ 《大都路总都管姚公神道碑》，见《元文类》卷68，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985—990页。

⑤ 关于金元之际的世侯与地方权势的变化，见萧启庆《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和婚姻》，《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1994年，第265—348页；赵文坦《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 二、从同居共财到宗族创立

战乱使得宋金时期的“衣冠旧族”受到重创，“近代因兵，缘边郡邑首被其害，当时势家贵族握据权位，其力足以扞患难，庇宗族，一旦猝遇扰攘，骨肉流离，至有无遗类口。”<sup>①</sup>金元易代直接导致了地方权势的更替。杨友一族既能世代做地方的保护者，其家族的发展必定较其他家族顺利。“自兵兴以来，乱离失所，辛苦愁叹之气溢于闾里。惟彦诚（杨友）睦亲保爱，骨肉完全，若不积功累仁，何得至此？”<sup>②</sup>杨友的崛起，取代了以前的“势家贵族”，其文化上也必有一定之建树，以符合其新获取之身份。在杨氏后代的叙述里，杨友、杨山的事迹不但是杨族兴起的故事，而且直接与后来定居鹿蹄涧村以及建设祠堂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下面是天历二年（1329）的一个故事：<sup>③</sup>

至元朝元帅公讳友、提控公讳山，于马峪田猎，忽见白鹿，趣逐之。其鹿不见，石板留其蹄迹，因以为庄，名曰“鹿蹄涧”。廉庄既定，木本水源之报又兴，创建祠堂，塑令开国公、武略、武功等神像五尊，春秋祭祀，乃仁孝诚敬之心，所以继祖宗之志者，绳绳不绝也。

这通碑的作者题为元贡生赵鹤鸣，该碑也是关于鹿蹄涧起源的最早记述。现在的杨家祠堂内，尚保留有刻有鹿的形象的鹿蹄石。鹿蹄石之下，是莲花座，再下是菱形柱础，上刻“元泰定元年宣圣十德”。由此来看，至迟在泰定元年（1324），杨氏的后人就围绕这个故事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创建了，包括树立鹿蹄石，创建祠堂等。

① 《王氏世德之碑》，见《繁峙碑文集》，第144—159页。

② 《杨友碑记》，前揭。

③ 道光《杨氏族谱》，卷9，“坟祠图”，《世忠名将杨氏祠堂碑记》，第4页。此碑题目与《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内容类似，作者也题为同一人，但是内容有抵牾之处，比如前者把建祠堂、树神像归为杨友的事迹，而后者归为杨怀玉的事迹；再如前者认为设立公田是杨友所为；而后者归与杨怀玉。李宏如估计此碑文为收入族谱时据原碑修改而成（《繁峙碑文集》，第57页）。碑文用“元朝”而非“大元”或“国朝”，似乎为元代以后被修改并编入族谱的。

鹿蹄石故事的讲述方式，容易使人误解为鹿蹄涧祠堂亦为杨友、杨山兄弟创建。实际上创立祠堂，是杨山之曾孙杨怀玉所为，而且这通碑文亦是杨怀玉邀请赵鹤鸣所撰。所以这个故事的结构有两层含义：鹿蹄涧祠堂是杨怀玉创建；杨怀玉把立村的事迹追溯到杨友、杨山兄弟。我们下面将分析杨友、杨山时代和杨怀玉时代的家族发展是何特点，以及为何杨怀玉要这样讲故事。

实际上，杨友时代，并没有有意识地建设家族。他的主要贡献，似乎全部与坟地有关。杨氏的基地杨兴铺（东留属），据说是先祖杨兴安葬的地方，俗呼七郎坟。其实如果我们留意杨友的事迹，就会发现，其实这里就是他所控制的最主要的地方之一，也就是杨氏所称呼的远祖的“祖坟”。实际上雁头村才是杨氏真正的家族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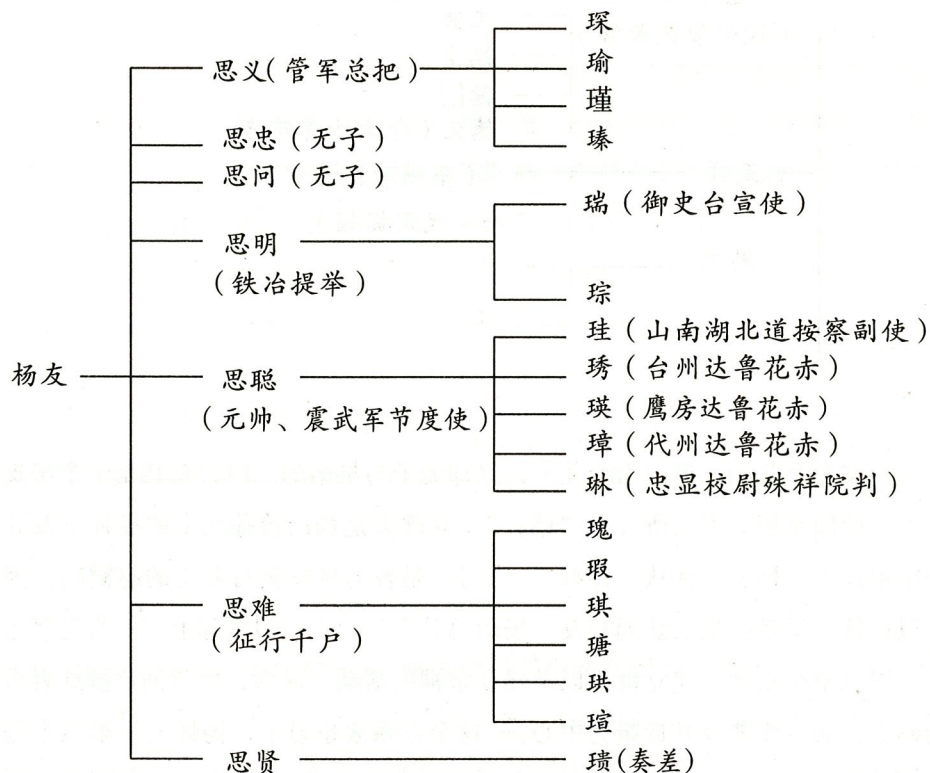
公一日政暇，念母年高，意在先茔葬埋。坚州之西，乃公先祖延兴之故茔也。询协阴阳，改卜于此，真佳地也。于己丑年四月二十八日，公以祖考安厝于斯，并祖妣王氏。欲将大夫人程氏、叔父茂、婶母王氏等附焉。

尽管杨友的叔父、婶母也附葬在此处，但是他们的后人，即杨友的堂兄弟并没有列其名字于泰定元年《弘农宗族图碑》碑阴的世系图中。这个世系图排列了从始祖杨业开始，一直到立碑的杨怀玉的十六代世系传承。正如碑文所言，立碑的目的是因为“切虑其后子孙年远不肖，宗派忘称，名与上祖相同，尤为不孝焉”。这同时说明，在刻写世系图之前，杨氏族入其实对于远祖的名讳也是不甚了了，所以杨怀玉才会这样强调宗派图的意义。但是如上所言，这个世系图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囊括所有以杨业为始祖的杨氏，它甚至没有包括杨友、杨山的叔父杨茂的子孙。它详细列的仅仅是杨友和杨山的子孙。此一安排的用意，是因为从杨友、杨山兄弟开始，才有同居共财的举动。根据《弘农宗族图碑》，杨氏实行同居共财的倡导者是杨友、杨山的母亲程太夫人。该碑记载了程氏去世前，曾经对她的两个儿子说过的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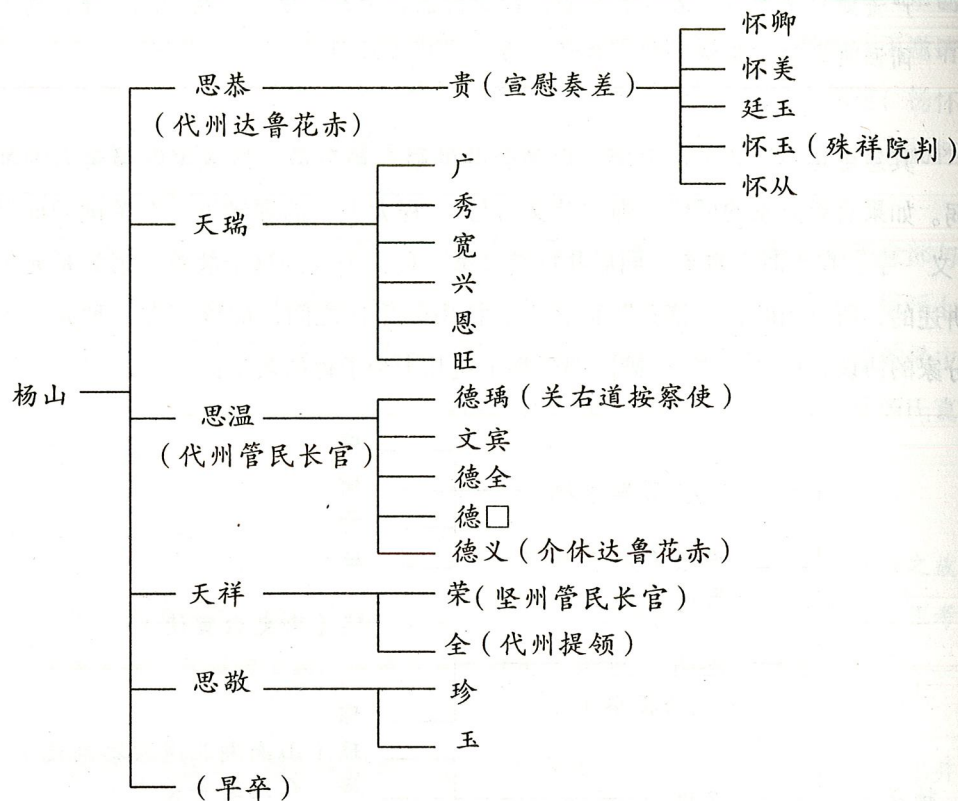
我之在堂，汝勤孝道。我之化后，义让同居。今视诸孙，未分优劣。尔等可立义书，以明我诚。如后不义，分别家门，另生异见，则可独出，其事

产资财分文勿与。若经官呈告，验此为证。于家之令，不在□□之理，岂不闻回贞之泣，荆树再花。尔等无违，宜其慎矣！<sup>①</sup>

其意思是不让儿子们分家，以免公共的财产被分散，造成家庭凝聚力的削弱。如果有要分家的后代，则“分文勿与”。程太夫人的训诫里一个关键的词是“义”字。在当时人看来，同居共财是义举。程太夫人的这个故事，因为是元末讲述的，所以当时在“诸孙”即杨友、杨山的后代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兄弟不分家的协议，即“义书”。碑阴即列举了这几十个子孙的名字：



<sup>①</sup> 泰定元年（1324）《弘农宗族图碑》，现存鹿蹄涧杨氏族祠堂，文字参考《繁峙碑文集》，第48—53页所收录之碑文。



杨友七个儿子、杨山六个儿子，除却无子与早卒的三门，总共是十个房支的后人。此即是程太夫人所言的“诸孙”。立碑者是杨山曾孙元末的杨怀玉及其四个弟弟廷玉、怀美、怀从、怀卿。<sup>①</sup>书丹的是曾为杨友撰写墓志的赵鹤鸣。因此可以说这个世系图虽然认同杨友、杨山总共十门后人，但实际上，一直是怀玉一支在操纵整个刻碑、建立世系以及建立宗祠的活动。通常，族谱的修撰或者世系的确立，必以作者及其近亲为中心。<sup>②</sup>这个世系表也显示，杨怀玉兄弟四个是整个世系的中心，他们的族兄弟辈的名字全都没有列在上面。因此，我们要了解程太夫人的家训，以及杨氏早期历史的构建，必须弄清楚立碑者杨怀玉的作为和他

所处的环境的关系。

其实，碑文也讲到，他们之所以可以同居，是因为共财。根据碑文，程太夫人所说的家族的财产主要指坟地和围场。根据天历二年（1329）赵鹤鸣所撰的《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土地在元末修族谱的杨怀玉时代达到最大规模：

（杨怀玉）于马峪偃头村护坟地壹顷二十亩……更外推本修霍山始祖坟一十顷。孤山太君夫人莹地二十二顷。坚州杨兴莹地壹顷二十亩。五里村莹地壹顷二十亩。杲村莹地六十亩。代堡莹地六十亩。仍置远祖围三处：远杨围、郭家庄、高崖沟围，栅子山地三十余顷，以供春秋祭品。

这些坟地、护坟地共计约36.8顷。我们先考查一下这些土地的分布：孤山、代堡，在坚州东部；偃头村、杨兴堡、杨家围，在坚州城以西。这两组田地皆位于坚州，但相隔很远。五里村在代州境内，高崖沟在崞县大阳乡南头村，杲村亦在崞县，霍山则远在南方的霍州。其余远杨围、郭家庄位置不详。这么多的坟地分别分布在代州、坚州、崞县、霍州等地方，相隔数百里，似非杨怀玉个人所能置办。或许是他的先辈利用职务之便所占，或许是联合了其他的杨氏所占，目前我们缺乏直接的材料来说明这些土地的获得途径。

但是这些土地的用途却是清楚的，他们反复强调土地是“以供春秋祭品”，即是作为蒸尝田来建设宗族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怀玉特意强调了高祖母程太夫人的家训，描绘了程太夫人去世时的盛大场面，强调家族同居共财或别居共财的一面，以此作为历史依据。

杨怀玉为何在这时才大规模地建设宗族，材料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可以做出初步推测。杨怀玉建设宗族之前，杨氏已经是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了，这其实是一个汉代肇端、兴盛于宋代的“义门”的传统。杨氏内部组织的强化，似乎与当时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蒙古国统治稳定下来之后，曾经于1235年、1252年和1270年在北方进行大规模户籍统计。<sup>①</sup>杨氏祖居地马峪里的魏氏，

<sup>①</sup> 《弘农宗族图碑》及其碑阴，碑现存杨氏祠堂，碑文及世系图主要依据《繁峙碑文集》，第48—53页。

<sup>②</sup> David Faure, *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 见《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259—296页。

<sup>①</sup> 关于元代“义门”的情况，参看刘晓《试论累世同居共财在元代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即是属于“上户”级别。<sup>①</sup> 朝廷的户籍统计无疑配合着流官对地方的直接管理。

在定户籍的同时，朝廷的官制改革对世侯的地位也有影响。一开始蒙古授予汉地世侯的官职，多是仿照金朝的官制，如元帅、都元帅、节度使等等。后来才渐渐实行蒙古官制，比如万户、千户、达鲁花赤等等。<sup>②</sup> 这种变化从杨友、杨山及其子孙的官职名称上很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当蒙古在北方的统治稳固下来时，他们会慢慢收回权力。1251 年，即蒙哥登上汗位的当年，“朝议厘定官制，州郡武职多见易置”，坚州的其他小世侯也受到影响。<sup>③</sup> 到了忽必烈时代，以蒙古人、回回、汉人、南人区别对待为标志的四等民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元朝地方行政人事安排。至元二年（1265）二月，朝廷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sup>④</sup> 此后仍不断地申明该项政策，至元五年（1268）三月，“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至元十六年（1279），“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因此，可以说至元年间汉人就不能充任地方的最高监临官了。<sup>⑤</sup> 杨怀玉的祖父杨思恭任代州达鲁花赤，族祖杨思温任代州管民长官，杨思聪任元帅震武军节度使，都是代州地方的长官。其族叔杨荣任坚州管民长官，杨全任代州提领，杨璋任代州达鲁花赤。根据官制的变化，他们在本地任职似乎应该最多延续到至元年间。

杨怀玉的父亲杨贵是宣慰奏差，即宣慰司负责上传下达的吏员。杨怀玉继承乃父，仍以笔墨任殊祥院的奏差（有时亦称殊祥院判）。天历元年（1328），殊祥院被废除，并入掌握神御殿祭祀典礼的太禧宗禋院，因此可以说殊祥院原本亦是负责礼仪的衙门。殊祥院的奏差也是负责传达的吏员。<sup>⑥</sup> 杨怀玉父子两代都为低级吏员，而且都没有出任职官，<sup>⑦</sup> 可见已非昔日光景。根据清代的碑记，杨怀

玉的一个兄弟廷玉曾授兵部左侍郎，调任凤阳，也已不在本地任职了。<sup>①</sup> 此外再无族人任官的记录。因此，杨氏此时建设宗族，可能有维护社会地位的用意。我们进一步看看杨怀玉当年的宗族建设：

（杨）贵生殊祥院判怀玉。尊祖敬宗，建祠堂于鹿蹄涧村。上溯远祖之所自，以及祖父，皆塑像，各立冢碑于马峪雁头村，护坟地一顷二十亩，凡翁仲、石兽充列俱备。<sup>②</sup>

杨怀玉“上溯远祖之所自”，由此可知这是一个大宗祠。但是祠堂里供奉的不是神主牌位，而是塑像。自赵复北上，理学开始在北方传播，元末重开科举，影响进一步扩大。<sup>③</sup>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氏的宗族建设，或许反映了理学正统和文化正统化的逐渐树立。

杨怀玉当时非常清楚杨氏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元天历《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首先讲述杨氏的世系，次讲杨怀玉的宗族建设，末尾又讲杨氏的分布：“故始无敌知代州，暨而散镇川广，流布英种于川广淮扬间，终则友、山复节度于代、坚，世系延绵之如此。”通过对先辈通谱的记述，杨怀玉把代州杨氏跟播州杨氏、淮扬杨氏联系了起来。他希望能把这个世系确定下来。“将三代之图，刻碣之阴，以贻后嗣，享祭之余，可为鉴矣。”<sup>④</sup> 刻世系于石碑，是金元时期山西常见的做法，而明清以来基本上被族谱和祖先图取代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宗族建设，体现了从宋金元到明代宗族礼仪的一个过渡阶段。

鹿蹄石其实起到一种“族徽”的作用，它所联系的历史，一端是作为世侯的历史，另一端则是兴建祠堂的历史。蒙哥汗到忽必烈时期，户籍制度的推行，以及朝廷对官制的厘定，使得世侯地位开始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家族内部的组

① 延祐七年（1320）《魏氏墓碑》，见《繁峙碑文集》，第161—166页，落款是“马峪里上户祭主雁门站提领魏广等众房族”。

② 张金铤：《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③ 《王氏世德之碑》，见《繁峙碑文集》，第144—159页。

④ 《元史》，卷6，中华书局，1976年，第106页。

⑤ 以上参考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49页。

⑥ 参考丘树森编《元史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00页。关于蒙元官制，感谢王东平教授答疑解惑。

⑦ 元代的吏制，参看赵世瑜：《史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2—127页；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第14、30页。

① 同治十年（1871）《宋元杨氏封秩》碑，现存鹿蹄涧杨氏祠堂。

② 天历己巳（1329）《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贡生赵鹤鸣作。赵在元末相当的活跃，成化《山西通志》记载他曾在后至元六年作碑文《石州嘉禾记》（见通志卷7“祥异”和卷17“碑目”）。杨怀玉曾邀请他为杨家写了不少碑记，包括上述的《弘农宗族图碑》。

③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第二辑，第217—224页；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卷5，中华书局，1993年，第636—679页。

④ 《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前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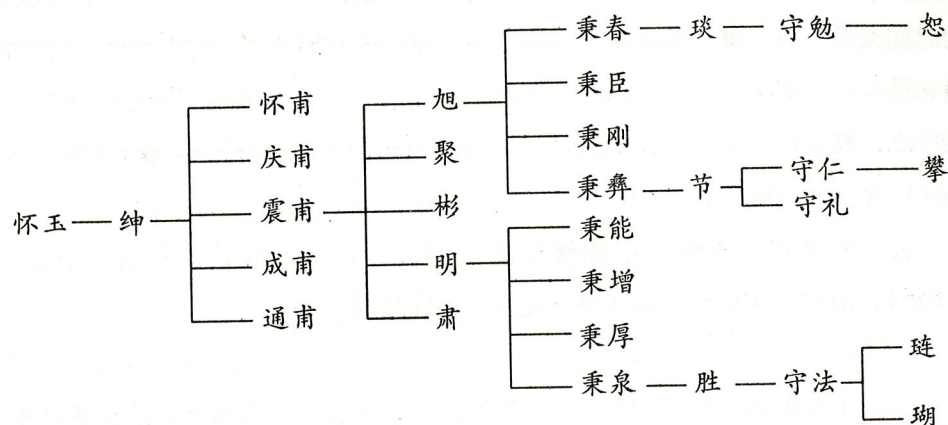
织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后人由同居共财开始逐渐创立宗族。积极建设祠堂的杨怀玉是个礼仪方面的专家，祖先的追溯、世系的拟定、祠堂的创建都是由他完成的。杨怀玉的后人由此掌握了对祠堂及宗族土地的控制。

### 三、明代鹿蹄涧杨氏的八门及其宗族设计

元末的战乱使得代州遭到很大破坏，席公举的《重修庙学记》说：“值至正戊戌，河东经兵燹，代当南北之冲要，车骑蹂躪甚他郡。民居公廨、诸圣庙宇鞠为丘墟。”戊戌为至正十八年（1358）。当年，原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叛山东，“曹、濮贼方分道逾太行，焚上党，掠晋、冀，陷云中、雁门、代郡，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sup>①</sup>。同时，代州又遭遇旱灾。天灾人祸造成的破坏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至正二十七年（1367），汝宁李元凤出任知州后才开始修复庙学。当时仍是“鲜民居，岁不加丰，军赋繁且急”，第二年（1368），局势稍微缓和，才正式动工修建。工程完成已经是改朝换代的洪武二年（1369）。此时代州被明军占据已经半年多了，而席公举在这篇记中，开头便是“圣元之崇文庙也”，而且碑文中根本没提及明朝。可见明朝的统治开始并得不到认同。<sup>②</sup>实际上，洪武三年（1370），明廷还命令唐胜宗“捕代县反者”，也曾命令陆仲亨“责捕盗于代县”。<sup>③</sup>这些所谓的盗贼，现在已经很难指实到底是哪些人了。

鹿蹄涧杨氏亦遭受重创，“元季窜分四野”，<sup>④</sup>族人流散，杨怀玉的儿子杨绅有五个儿子：怀甫、庆甫、成甫、通甫、震甫。其中怀甫迁居到保定府定兴县留村，成甫迁居真定府定州行唐县，通甫迁居顺天府大兴县，庆甫无后，留在鹿蹄涧的全部是杨震甫的后人。他曾任元朝“浙江温州水师统领挂印总兵”。<sup>⑤</sup>震甫生子五人，其中肃、彬、聚迁移到外地，留在代州的是明与旭。明代的杨氏分别

是他的两个儿子杨旭、杨明的后人。以下为鹿蹄涧杨氏八门世系图。



明初设立里甲，鹿蹄涧杨氏成了大明王朝的编户齐民。“遗风至旭，遂属民于山西太原府代州望台里。”<sup>①</sup>无疑，杨明、杨旭分别是明初的入籍祖。族谱里没有出现“入籍”这样的字眼，可能是为了证明他们原来即是本地的居民，比明初入籍的历史要更加悠久。

由上世系表亦可见，二人各有四个儿子，合起来共八门。八门就是后来鹿蹄涧村杨氏的基本构成。八门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很可能是明初政治和经济环境变动下形成的。八门之外的其他宗支，基本上是联宗通谱产生的结果，对鹿蹄涧土地、祠堂和祭祀等没有支配权力。鹿蹄涧的大量族田即护坟地，是八门轮流耕种，作为年节祭祀费用。族谱记载八门的权利和义务：<sup>②</sup>

祭祀财物出自护坟之地。杨兴铺七郎坟地一顷二十亩，雁头村元帅坟地一顷二十亩，镐村坟地六十亩，马峪坟地一顷二十亩，远杨等围共护坟地三十顷，安家嘴供祭地五十亩。八门轮种，收粟以办祭祀，勿得搀越错乱，违者宗子责治。

①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386页。

② 光绪《代州志》卷6，“金石志·重修庙学记”，第21—23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5年。

③ 《明史》卷131，“唐胜宗传”、“陆仲亨传”，卷308“胡惟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850、3851、7907页。

④ 《明处士杨翁孺人杨母高氏合葬墓志铭》，墓主杨恕，嘉靖四十一年（1562）去世，铭石存鹿蹄涧村“根祖文化园”。

⑤ 杨绅、杨震甫的官职俱见同治十年（1871）《宋元杨氏封秩》碑，现存鹿蹄涧杨氏祠堂。

① 《明处士杨翁孺人杨母高氏合葬墓志铭》，前揭。

②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18页下。

这几块护坟地，总数高达 3470 亩，而且都是蒙元时期已经存在的。其中杨兴铺、雁头村、马峪、安家嘴分布在繁峙界内，镐村在崞县。从它们变成祖坟地的时间来看，杨兴铺、雁头村、马峪等地是蒙古国时期即存在的老坟地，而安家嘴和镐村很可能是明代才增加的。这些土地没有一块是在鹿蹄涧所在的代州的，换言之，都是以“寄庄”形式存在的。理论上讲，这种以寄庄形式存在的土地，是比较容易逃脱赋役的。

公田的存在，使得他们能够按照礼制进行宗族的建设。嘉靖三十五年（1556），山西提学副使陈榷在褒扬鹿蹄涧杨氏时说：

及入我明，允沾世泽，支脉繁衍，文武侯伯，云仍相继。且能重祠祀、明宗谱、立家约、遵圣教、置公田、立射圃。<sup>①</sup>

可见，在陈榷对杨氏表彰之前，他们已经有一系列构建宗族的努力了。其中，所谓修宗谱、立家约、置公田、立射圃等活动，不见于元代的文献，因此应该是明代的创制。根据族谱记载，宗族之建设，大规模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明初永乐时期的杨明、杨旭，他们成了后来“八门”的祖先；第二次是宣德年间曾做过绥德州的知州杨节；第三次是嘉靖万历年间的杨攀、杨瑚，他们是后来和播州联宗，使杨氏受到表彰以及编写家谱的主要人物。最迟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们已经是相当规整的宗族了。从上面的世系图可见，后两次宗族建设的主角杨节及其孙杨攀，族孙杨瑚、杨珪，分别是八门之中的秉泉和秉彝两门。

但是，杨氏八门所能追溯的共同祖先，只是明初的杨震甫。从杨震甫到杨瑚、杨珪、杨攀诸辈，杨氏也只有六代人而已，刚刚过了“四世则迁”的阶段。无论怎样说，八门都只是元代传下来的一个小分支的后人。但是这个小宗支，在明中后期却努力地去建设一个标准化的宗族，甚至行大宗之法。

杨氏有宗子，我们仅仅从“旧例”中知道宗子“未立之先，须择德行服众者立之。既立之后，必有大故不能应事，方可选替”。看来，宗子的选择并不是

按照“嫡长子”的原则来进行，而是通过推举的方式确定的。根据族谱规定，宗子主合族之事，如果八门轮种公田错乱的话，宗子有权责治；族人如果遇丧不吊，或者“丧家鄙吝”、“户人怠忽”，宗子即以不孝加以惩罚；族人的婚姻，宗子亦有权干涉。<sup>①</sup>

杨氏的祭祖活动同样很有组织。杨氏每年又选祀长三人，分别主出纳分胙、办理祭料、洁净祭器和迎请随祭之人。在正旦、清明、冬至等节，祭祠堂众祖神主（而非塑像）。在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拜扫坟茔<sup>②</sup>。族谱中收录有一篇《公田记》，可能即是嘉靖年间的杨攀、杨瑚的一个朋友所作。据说杨氏每年的祭祖费用便是取诸这几十顷的公田：“每祭三百余人，需金之数，不行会敛，皆取诸护坟之公田。”<sup>③</sup>

祠祭的对象则是从杨令公开始的很多个世代的祖先，在祠祭的时候杨氏表现得非常合乎礼制。《公田记》的作者亲眼目睹杨氏祠堂祭祖的盛况，对此大加赞赏，称之为“无不有礼”，“非徒事虚文”，“斯举也，尽仁孝之思，辨尊卑之分，洽神人之欢，诚不刊之巨典”。因此，至少明中期的时候，杨氏试图在祠祭上做一个标准的“礼”的家族。作者希望“记之以观礼者采”，即是把杨氏作为当时实践礼制的榜样，希望能引起官府的和推广。

杨氏的标准的礼的表现还包括反对佛、道、巫术等，族谱规定“不可从道士烧炼，不可信浮屠看经，不可容师巫出入”，所以在宗族礼仪上，杨氏实际上表现出严格遵循儒家伦理的特点。可是，当我们反观蒙元时期的时候，发现杨友其实是非常热心佛教和道教活动的，“重修寺观，尝请延缁侣，结春夏讲。设席建坛，屡修黄录之筵；敷演梵音，尝起万僧之会”。<sup>④</sup>其母亲去世的时候，杨友

① 《杨氏族谱》卷 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 17—19 页。

② 《杨氏族谱》卷 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 18 页上。

③ 《杨氏族谱》卷 1，《旧谱纪略·公田记》，第 23 页下—24 页上。据该纪略第 16 页，在大约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彦棻提到：“至于世次封秩之详，则存其世家本纪，录其诰敕券文以备参考焉。至其《原宗录序》、《题词》、《人物表》、《宗说》、《公田》、《习射》等篇，不知何代所作，皆未着其姓名，内间有差讹及文势难通者，盖传写之谬耳，今亦无所考证，不敢妄为删改，俱存旧文以俟后君子裁焉。”因此这篇《公田记》应该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前已经存在之文献。因此很可能是嘉靖年间的杨攀、杨瑚等人所作。

④ 《杨友碑记》，前揭。

① 嘉靖三十五年（1556）《表忠祠碑记》，现存鹿蹄涧杨家祠堂。

极力铺张，请了“缙侣千余”来做法事。<sup>①</sup>可是，在明中叶的时候，他们却要把反佛、道的规定作为家约写入族谱，亦成为官府对其加以褒奖的依据之一。

杨氏亦强调科举入仕。第二十二代杨节，少年时代受过宋代大儒杨时的影响，“殚心诗书，锐志道德”。据说宣德十年（1435）曾做过绥德州的知州。<sup>②</sup>他们在明代颇重视科举教育，如处士杨恕“翁冀彼先伯祖皆以科名终身，遂严教子孙，是以长子廷瑗以承差授西乐驿丞秩；次廷珠，现候吏部，冠带省祭。长子配李氏，生孙曰檀、曰楠，充布政司一承一吏；次子亦配李氏，生孙曰楫、曰棣，皆业儒，为代州庠生，年方弱冠”。这种状况部分归功于他良好的经济状况，“遵守农桑，遂致家隆兴，族之官居者同富庶”。<sup>③</sup>族人获取功名，也是家族建设的必要条件。可是除了杨节曾担任知州外，其后人杨攀等人并没有科举功名。前述处士杨恕的子孙也只是任职驿丞和庠生而已，并无特别高的功名。其宗族之建设与发展，除了大量公产之外，还有他们联宗的策略。

#### 四、大宗祠与杨氏正宗的塑造

明代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设，虽然在礼仪上尽量做到正统化，但是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变通，比如选择宗子采用的是推选，而非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早在元代杨怀玉建设宗族的时候，杨氏祠堂所立的就是令公以下的诸位祖先的塑像。到了明代，祠堂似乎仍延续了塑像为主的样式，“立庙从祀，以中书令祖为中立不迁之像，下则取有功国家者，余皆从祀两廊，有爵书爵，无爵排其名，以序昭穆”<sup>④</sup>。所以杨氏的家庙塑像不是严格按照长幼资格的，而是以官爵取向。同时塑像的延续，也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在利用一个更早的文化传统。

因为元、明时期杨氏所谓的“宗”，是一个从宋代的杨业开始的世系，祠堂祭祀也以杨业为始祖，所以杨氏宗祠是个大宗祠。实际上，明代鹿蹄涧的宗族建

设者明显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不断地“原宗”，即通过对先代世系的重新梳理和确认，力图树立杨氏正宗的地位。根据《杨氏族谱题词》，当时“满天下率皆伯侨之后”，作者“杨君”曾极力考证，证明自己才是周成王之孙伯乔的后人，“原宗脉之传，以别诸杨”<sup>①</sup>。嘉靖三十五年之前，在族谱之外，“杨君”已经编写了《原宗录》这样的作品，族谱所收是该书序言：<sup>②</sup>

郡传鹿蹄涧巨族杨氏，乃宋将中书令杨业之后也，人言虽若，将信将疑，及诣见故家遗物、祠堂、碑训，因而询及家谱，简帙重大，杨君出所自叙《世家》、《原宗录》以示，愚启而观之，开口传家，其来尚矣。公卿名将无世无之……（杨君）原其始祖，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以明其宗脉，以序其昭穆，以序其爵，以序其贤，以录其功，合大小之宗，联支庶之众，摘简绌繁，典而明也；制理陈事，严而辨也。

可见，确实有些人很怀疑鹿蹄涧杨氏是否是杨业的后人，杨氏为了取信于人，不仅展示了“故家遗物”以及祠堂等这些实物，还有大部头的家谱，并且自己撰写了作品以证明之。现在族谱中收藏的除了这篇《原宗录序》之外，还有《原宗录引》、《叙原宗说》、《宗说》等三篇文献。证明自己是正宗，与杨氏的联宗策略有关。根据嘉靖之前的《叙原宗说》，其联络的范围为崞县镐村、大阳乡、繁峙代堡、大同、束鹿、翼城、曲沃、蒲州、泽州、播州、六合、汉中、开平、安化、雅州等地的杨氏。“俱以册页墓志碑记统入宗谱，俾诸杨在外者知我宗脉以会其极，以归其宗。”在当时礼制之下，即使是品官之家，其祭祖亦不能超过四代，对于立大宗是有忌讳的，但是他们觉得“从小宗之法则散，从大宗之法则僭，不从宗法则乱。与其乱而散也，莫若从僭，以联吾宗，谱族之萃于一矣”。<sup>③</sup>

① 《弘农宗族图碑》，前揭。

② 查顺治《绥德州志》卷6，《宦迹》，明代的绥德知州确有杨节其人，但是籍贯和任职年代都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州志将其归入景泰年间，与族谱所谓正德十年有很大差距。而乾隆《绥德州志》甚至没有杨节的名字。

③ 《明处士杨翁儒人杨母高氏合葬墓志铭》，铭存鹿蹄涧“根祖文化园”。

④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18页上。

①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17页上。

②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原宗录序》，第20页上—21页上。根据约万历三十五年（1607）任彦棻的《杨氏传略》（《杨氏族谱》卷1，页16下）：“至其《原宗录序》、《题词》、《人物表》、《宗说》、《公田》、《习射》等篇，不知何代所作，皆未着其姓名”，故《原宗录》必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很早以前写成，撰诸此前杨攀修祠堂、编族谱之事迹，“杨君”很可能指的是耆老杨瑚。

③ 《杨氏族谱》卷1，第21—22页。

可是，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鹿蹄涧杨氏宁愿僭越礼制，也要行大宗之法？是否仅仅是为了“会极归宗”？为了解此点，我们以族谱中记载较多的与开平杨氏联宗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开平杨氏据说是来自播州杨氏，其先是杨令公之曾孙杨贵迁。杨贵迁的父亲广州刺史杨充广因“持节广西，悯播州之孙昭无子，遂以贵迁嗣之。自是，开播者皆业之后也”。明初，其后人杨政从军，任汉中卫百户。杨政之孙杨洪迁开平，因功封昌平侯。<sup>①</sup>

据其传记，杨洪是正统、景泰年间的大将，与其子杨俊、杨杰，其侄杨信多年镇守长城沿线，尤其是宣府、大同二军镇，声威煊赫<sup>②</sup>：

（景泰二年）五月，上虑虏情反复，宜有大将在边，乃命公挂镇朔大将军印，领禁卫兵千六百往镇宣府。虏闻公至，皆自引去。……蒙赐敕奖谕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军声为之大震。关北之人固皆以为虏不足为其患，关南之人亦莫不为奠枕而安曰：“有杨公镇宣府矣。”……至于壅塞道路，求识其面不得，辄快快终日者，其声价之得于人也如此！

传记所载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杨洪在雁门关南北确实有很大影响，《明史》称：“洪父子兄弟皆佩将印，一门三侯伯。其时称名将者，推杨氏”。声威如此显赫，以至杨洪后来以“盛满难居，乞休致”<sup>③</sup>。鹿蹄涧祠堂所存的元代的碑刻上已经有与播州杨氏通谱的记载，<sup>④</sup>明代的联宗通谱，大约就是在杨洪任镇朔大将军的时候，鹿蹄涧的杨氏跟杨洪为代表的播州杨氏有过一些交流，根据族

① 《昌平伯进侯追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道碑铭》，《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续修四库全书）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② 《昌平伯进侯追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道碑铭》，前揭。

③ 《明史》卷173，第4607—4613页。

④ 播州杨氏是杨令公的后代，这种说法应该自南宋就开始了，谭其骧先生的《播州杨保考》（《史地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已有论述。至于族谱载从播州迁徙到扬州六合，却有一点疑问：明初宋濂为播州杨氏作的《杨氏家传》里仅说第五世杨选生十三个儿子，只有轸、轼最贤明。那么杨轸当跟他们属于同一辈分（第六代），时间当在南宋初年，这样抗金名将杨存中才有可能跟他通谱。但按鹿蹄涧族谱所收碑记，杨轸是第八世，做六合令在庆元（宋宁宗年号，1195—1200）间，与杨存中生活年代相差较远，姑存疑。

谱所收《开平杨氏续录序》，明确记载的有下面几次：<sup>①</sup>

| 参与者               | 年代      | 地点 | 备注          |
|-------------------|---------|----|-------------|
| 杨景（杨洪父）<br>与杨明、杨旭 | 永乐      | 代州 | 从汉中调开平，路经代州 |
| 杨洪与杨节             | 约宣德至景泰间 | 北京 | 欢如平生，咸以宗人亲之 |
| 宣府参将              | 嘉靖万历    | 代州 | 瞻拜祠堂        |
| 杨攀                | 嘉靖万历    | 播州 | 会谱          |

嘉靖时，杨瑚新续族谱，特意给开平杨氏留有一个位置。他在《开平杨氏续录序》里，认为鹿蹄涧与开平杨氏二家的分流其实从宋代就已开始了，现在只是重新合流而已。并申明联宗不是结党，不是“系于宗党比昵之私”，是求同存异而已。他所说的“求同”，即双方认同的基础，乃在于都是将领之家：“吾家以介胄名，敢以当代分流介胄之士而有不同乎。”<sup>②</sup>可以说，杨氏的大宗祠除了营造杨氏正宗的作用之外，便是服务于联宗的需要。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驿丞杨攀和耆老杨瑚还曾不远万里去播州联宗。

杨氏从永乐开始，即刻意与显赫的家族，尤其是边关守将联宗，把他们置入家庙之内。开平杨氏其实是个军人的家族，军人需要的是一个忠义的认同，前述与鹿蹄涧杨氏联宗的杨洪，就曾经建有“忠义堂”。<sup>③</sup>

同样，鹿蹄涧的祠堂里悬挂有地方将领赠送的匾额，比如附近的北楼口守将蔡元熙赠送的“三晋良将”的匾额。<sup>④</sup>他们对于军人的重视，其实很大程度上在刻意塑造一个忠义之后延绵不绝的印象。而为了了解这个印象的更直接的意义，还需明白在这个制造形象的过程中官府所扮演的角色。

①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开平杨氏续录序》，第24页下—25页下。

② 《开平杨氏续录序》，前揭。

③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1，《忠义堂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4—5页。

④ 《杨氏族谱》卷9，“坟祠”，第3页。

## 五、官府对“忠闾”的表彰

鹿蹄涧杨氏在嘉靖万历年间建构宗族的活动，其实有官府在有意无意地不断推动着。早在嘉靖三十年（1551），驿丞杨攀和耆老杨瑚便请求山西布政司右参政赵锦<sup>①</sup>为其写了一篇《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在叙述了杨令公、杨延平、杨再兴等人抗辽或抗金的事迹后，赵锦说道：

延历我明，尚守家庙祖像，延绵七百余年，能遵王道以立训，明宗法以类族，耕公田以奉祀，习将略以游艺，各缘分而耕读，无即陷淫，无从匪彝，犹有虎将之高风。况支脉繁衍，布满四方，为武英之世胄如□□□□昌平侯、彰武伯；为文杰墨翰有兴济伯杨善、御史杨滋、绥德州太守杨节之众。观此不唯传之悠久，抑且蔓生广大，可见祖德宗功，父忠子义，缙绅名物，孚于今古；仁义英贤，相半朝野，殆非土断白籍之人家也。<sup>②</sup>

巡抚赵锦自然知道杨善、杨滋不是代州籍，但他既然认定二者是鹿蹄涧杨氏的本家，也即是承认了鹿蹄涧杨氏此前联宗通谱的结果。不仅如此，他还赠送了“虎将高风”匾一块，并为此写了匾叙。<sup>③</sup>此处需注意建设宗族非常积极的驿丞杨攀。驿丞一职，在晋省北方门户的代州十分重要。驿站平日只需传递公文，而在秋防时候，兵马钱粮交通至为繁忙，因此担当驿丞的往往是富家大族。

所谓“仁义英贤，相半朝野”，其实大部分是联宗的结果。在鹿蹄涧杨氏的推动之下，这种宗族建构的活动得到了官府的承认。就在赵锦为杨氏写了上面的门匾叙之后的第五年，山西提学副使陈榷奉命整饬山西等处学校，从太原出发，经忻州，到代州，他写道：

学务之暇，阅名山，题胜概，而后观风采俗，果地杰人灵。由是道经杨延兴坟川，曲隐闾约有五百人余，乃自宋元而共族同塋，似有江州陈公累世敦睦之风，且存宗谱祠堂，实宋中书令代州刺史赠太尉追封开国谥忠武杨公业之宗裔……及入我明尤沾世泽，支脉繁衍，文武侯伯云仍相继。且能重祠祀、明宗谱、立家约、遵圣教、置公田、立射圃，有裨治化，宜表扬世教，以劝忠勇。先会同布政司行移文代州官吏，监刻“表忠闾碑”并“奕世将略”牌匾外，余复记于碑阴……莫废勋干之陵寝，勿混功臣之田土，庶祀典孔昭，酬忠勿替，为此表而记之。<sup>①</sup>

这次对杨氏的表彰，是由提学陈榷提出，由省布政司和代州两级官府所施行。称杨氏为“忠闾”，表彰杨氏的目的，乃在于“表演世教，以劝忠勇”。而且，这个表忠闾碑同时也确认了杨氏的一些经济利益，“莫废勋干之陵寝，勿混功臣之田土”。这一规定对杨氏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他们自元代以来就拥有大量的土地了。

官府给予了杨氏特殊注意并非没有原因。代州毗邻长城一线，嘉靖年间蒙古军队频繁入侵，代州修建了大批的堡垒，鹿蹄涧即为代州东部一大堡。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初，蒙古军队从东边而来，和官军在鹿蹄涧附近的枣林大战。官府“先给告示给乡民，各截杀逃贼”。鹿蹄涧杨氏亦参与了战斗，“据代州东烙铁县堡居民杨诵等报验：本月初一日，达贼攻堡，诵等率众打砍，斩首级一颗，获达马一匹，夷器等件”，因此被奖励一百两白银。<sup>②</sup>嘉靖四十四年，敕谕各路筑堡修寨造钟，同时“蒙山西巡抚兵部左侍郎万大人奏准，敕赐本堡公正堡官一员杨哲，筑堡修寨造钟”。<sup>③</sup>杨哲就是与播州通谱的杨攀的嫡孙，同时被公举为经理的还有杨彩、杨朗、杨干臣等。其中杨干臣就是当年刻《表忠闾碑记》的人。嘉靖中后期官府对杨氏的表彰，其实是在地方军事化的过程中进行的。官府力图通过树立典型来“以劝忠勇”，而鹿蹄涧杨氏亦可借机增强自己的

① 查光绪《山西通志》卷12，《职官谱三》，嘉靖年间任职山西的赵锦，实是良乡人。查《良乡县志》卷8，《艺文志·守朴赵公墓志铭》，赵锦职务实为山西布政司右参政，与族谱所记山西巡抚不同，兹从县志。

② 《赠雁门杨无敌宗嗣门匾叙》碑，现存鹿蹄涧杨家祠堂。

③ 《杨氏族谱》卷9，《坟祠图》，第3页上。

① 嘉靖三十五年《表忠闾碑记》，碑存鹿蹄涧杨家祠堂。

② 《督战报捷疏》，见赵时春《浚谷先生集》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第22页。“烙铁县堡”是“鹿蹄涧堡”之音讹。

③ 新修《杨氏族谱》卷7，《鹿蹄涧堡择要敬录》，第177页。

地方影响力和保护财产。

上面提到，永乐以来鹿蹄涧杨氏跟播州杨氏的多次通谱，不过万历时，播州杨氏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杨应龙的叛乱。杨攀挺身入播当在杨应龙叛乱以前。当时播州杨氏跟中央的关系尚好，如嘉靖元年（1522）朝廷还曾赐《四书集注》给播州儒学。杨应龙叛乱从万历十七年（1589）到二十八年（1600）。三十一年（1603），播州“余逆”复叛，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明“分播地为二，属蜀者曰遵义府，属黔者为平越府”。<sup>①</sup>这次平叛结束了杨氏盘踞播州八百年的历史，影响巨大。而作为播州一支的开平杨氏，此后亦不见与鹿蹄涧杨氏有联系。杨应龙叛乱的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有人把他们这一支从鹿蹄涧《弘农宗族图碑》上抹掉了，<sup>②</sup>根本不承认他们曾经跟播州杨氏有关系。作为世代忠勇的杨家将的后代是不允许出现叛乱者的。

但是杨家的象征意义并不因杨应龙的叛乱而有所损伤，叛乱平息仅仅三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时候，雁平兵备道康丕扬在代州大阅兵马，整顿吏治，修缮城堡，整饬武备。之后又采取了一些文化措施，包括课学校、表贞烈等等，并修缮了代州境内的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遗址，如李晋王墓、武安君庙等等，<sup>③</sup>接着他注意到了鹿蹄涧的杨氏：

案牍稍暇，披阅地志，见宋代杨氏世居代州。访其后有郡庠诸生者四人，为编民者三百余家，皆居代之东北名鹿蹄涧，不知几历世矣。又扣其家藏，厘然族谱在焉；寻其塋墓，屹然碑碣存焉。于是取其谱牒，重为修缮，刊刻钺梓，以彰旧勋。意若曰：杨氏忠义之后，子孙必有兴者。睹遗编而兴思所为，笃忠贞以绍先烈，必由此矣。颛蒙之俗，岂无豪杰，或有崛起岩穴，闻杨氏遗泽，而有兴也，作起忠义必由此矣。今日钦市，我不虜虞，异日戎狄或生异心，闻雁代之有世族，必且偃焉，退却而潜消不道之谋，亦未

① 《明史》卷312，第8044—8049页。

② 新编《代县志》中作者的观察。笔者也注意到，碑上播州杨氏一支自杨贵迁（文贵）以下都被剥凿掉了。

③ 李晋王即五代沙陀人李克用，他被认为是忠于唐王朝的典型；武安君庙祭祀战国和匈奴作战的李牧。代州至少有三个李牧祠，其中之一在雁门关，为万历中雁平道和振武卫官员所创建。

可知已。是举也，所增重于社稷，陶范于民风者，岂小补哉！

康丕扬很善于发掘杨氏的意义他希望这个颛蒙之地，即野蛮未开化的地方，能够“作起忠义”，震慑蒙古。所以其褒奖杨氏的目的即在于把杨氏塑造成“增重社稷”、“陶范民风”之典型。他以修谱的事委托山西粮储兵马兼管屯粮户部河南清吏司郎中任彦棻，任“勉承公之至意，乃取杨氏旧谱，稍为检阅，讹者正之，缺者补之”。<sup>①</sup>这次修谱完全是官府的越俎代庖，以官方而修私家之谱，似乎颇有些匪夷所思。但考虑到杨氏的意义以及杨氏入明以来与官方交往的历史，也并不难理解。

据忻州杨振宗的《族谱序》，任彦棻的修谱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尽管此前族谱已经收录了《公田记》、《射圃记》等文，但是这次是《杨氏族谱》在明代的唯一一次正式修撰。新谱分为四卷，“证诸史传而总其大略，加《杨氏世谱序》及《杨氏传略》”。任彦棻这次所写的《杨氏传略》，则是很长的考证杨氏历史的文章，它从杨氏之起源一直讲述到他执笔的当代，这样系统的论述，在杨氏历史上没有先例，同时它也代表了官府塑造忠义典型的努力。

杨氏家族的命运和光荣一直是在“忠义”的话语下进行的，这无疑决定了他们政治选择上的某种倾向，比如族谱凡例中规定：“族众小童入学，先读我太祖高皇帝圣训，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皇训洋洋，昭如天地，我宪章之，是不可悖。”朗读明太祖的《圣训六谕》，以乡约的内容教育后代，是要在思想上向国家认同。不仅如此，他们积极跟高级官僚来往，族谱凡例中也明确规定，“（族谱）每三世一续之，求名人为序，违失者以违犯教令治罪”<sup>②</sup>。这一规定体现了杨氏对正统地位的诉求和塑造。而这种诉求和塑造，实际上也得到了官府的配合与支持。

## 六、结语：从“忠间”的形成看地方文化

鹿蹄涧作为“忠间”的地位的形成，其实反映了元明三百年间宗族礼仪在

① 新修《杨氏族谱》，《重订杨氏世谱旧序》，正文第1—2页。

② 《杨氏族谱》卷1，《旧谱纪略·族谱旧例》，第18页。

代州演变的完整的时间序列。蒙元时期杨友、杨山影堂的建设，没有超出墓祭的范围，而且当时祭葬还延请大量僧人。到了元中后期杨怀玉的时代，除延续墓祭之外，开始在鹿蹄涧村兴建祠堂，供奉始祖杨业等人的塑像。到了明嘉靖年间，杨氏一方面努力塑造杨氏正宗的形象，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宗族礼仪的建设，也即是当时官府所看到的“重祠祀、明宗谱、立家约、遵圣教、置公田、立射圃”等等，并在族规中反对佛道师巫。这些活动反映了杨氏努力按照当时的标准礼仪来建设宗族，并进一步获得官府的承认和表彰。当时的制度背景，一方面是“大礼议”之后宗族礼制的变化，<sup>①</sup> 另外一方面则是北方边境的军事化和国家积极在北边推行“忠义”的结果。杨氏的“忠阍”称号，不仅是对杨氏作为忠义传人的表彰，同时也是对杨氏宗族建设的肯定。

鹿蹄涧祠堂的一些特征，比如塑像而非神主牌位，而且祭祀的只是具有功名的先祖，并不是所有的祖先。另外，历史悠久的祖像“影”，在明代仍然是某些家庭祭祖的主要方式。后来，随着宗族的推广，至迟在清前期演变为祠堂的图纸表现形式“容”，并被作为主要的祭祖仪式。<sup>②</sup> 这一点与珠江三角洲以祠堂和神主为特征的标准的宗族礼仪并不一致。由这点我们看到，一个更加悠久和坚固的礼仪传统，是如何影响地方接受新宗族礼仪（朱熹家礼）的。

自始至终，无论礼仪怎样变化，拥有共同的财产一直是杨氏能够不断进行宗族建设的基本条件。从蒙元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到元中后期杨怀玉一支居于主导地位，到明代的杨氏八门，尽管人群分分合合，但是对坟地的管理一直都是杨氏宗族活动的内容之一。嘉靖年间，官府对他们奖励的同时，便希望“勿混功臣之田土”。甚至到了清道光年间，在杨氏和五台山喇嘛争夺令公塔的护塔地的案件中，杨氏仍以族谱和朝廷的功臣祭祀作为宣示所有权的依据。<sup>③</sup> 文化的正统性其实是与作为控产机构的实际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杨氏宗族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

① 大礼议带来的礼制变化，参看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第1—20页。

② 关于“影”与“容”，以及“容”与“祠堂”的关系，可参看笔者的硕士论文《边塞与宗族——宋金以降代州的权势变动与文化认同》（北京师范大学，2007），第70—78页。

③ 《杨氏族谱》卷9，《坟祠图·控五台番僧侵占墓塔地基状》第7页下—10页下。